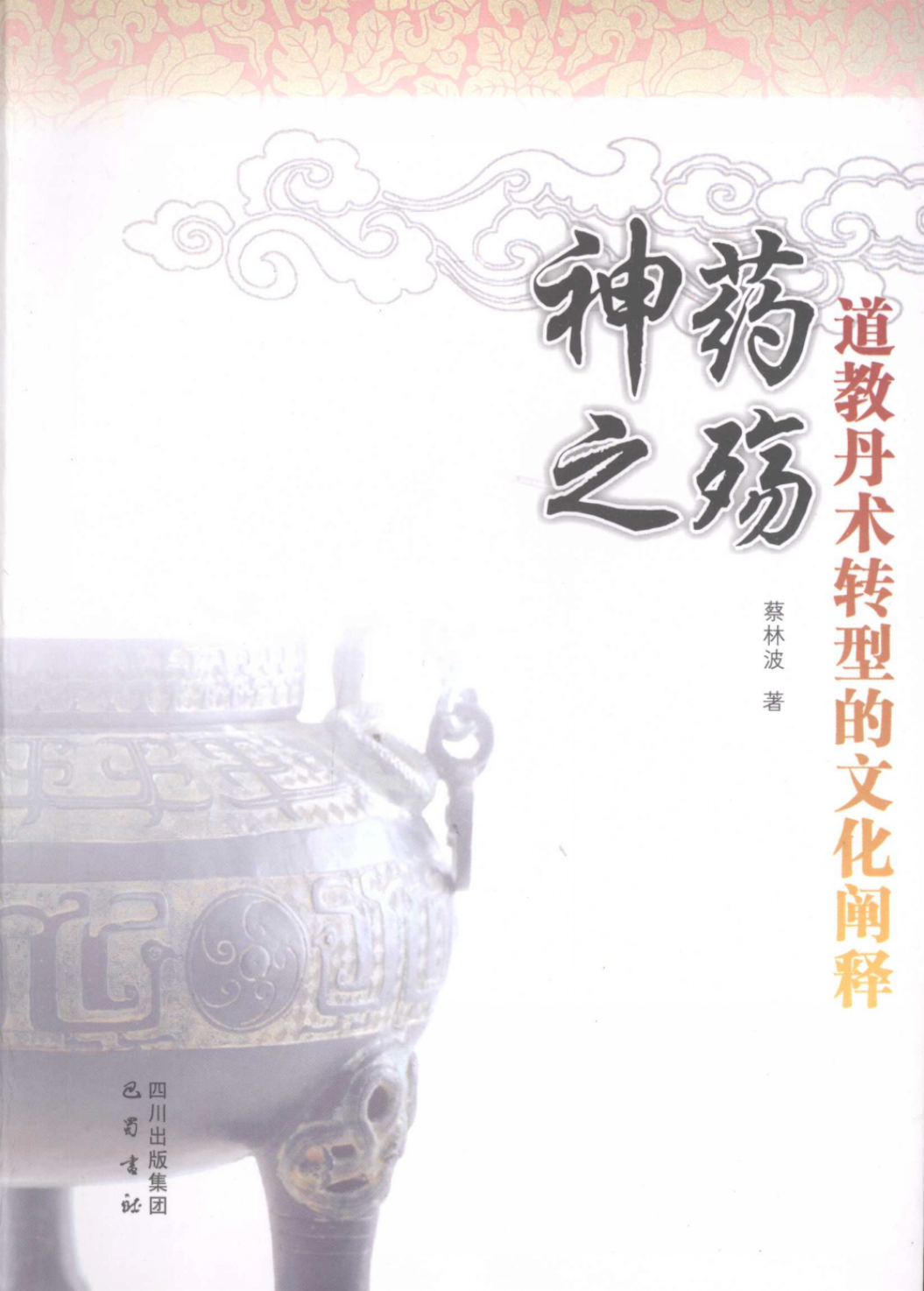




神药 之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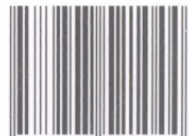
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

蔡林波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 神药之殇

ISBN 978-7-80752-104-4



9 787807 521044 >

定价：29.00元

本书系GPSS-MAP国际大奖计划“科学、道家与再启蒙”项目
(STAR : Science, Taoism and Re-enlightenment;
Grant ref. : GPSSMAP04-06) 成果之一

神药之殇

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

蔡林波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药之殇: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蔡林波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8. 8

ISBN 978 - 7 - 80752 - 104 - 4

I. 神... II. 蔡... III. 道教 - 炼丹 - 文化 - 研究
IV. B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6589 号

神药之殇: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

蔡林波 著

-
- | | |
|------|---|
| 责任编辑 | 谢正强 况正兵 |
| 封面设计 | 张 科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
| 网 址 | www.bsbook.com |
| 发 行 |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
| 印 刷 | 成都白马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03mm × 140mm |
| 印 张 | 11.625 |
| 字 数 | 26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752 - 104 - 4 |
| 定 价 | 29.00 元 |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一

道教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诠释意义，在过去是长期被忽略或低估的问题。这可能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面对近代命运中国人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对道教等传统文化所持的强烈贬斥态度，已在事实上延续成为一种近代式的历史观；二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近代以来道教在中国社会各领域所占有的文化比重迅速下降，其现实生存及发展空间因而受到严重制约；三是西方科学技术和医学的传播，对古老的道教神仙学说和医学养生方术等信仰体系构成强烈冲击，而其教内并未出现应激性的变革，未形成适应性新形态。因此，道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主流中并未占据地位，未能成为社会主体人群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诉求的方式。

事实上，这些问题强烈地制约着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文化解释学的合理性，加之一些西化、崇儒、信佛之近代学者的排斥甚至谩骂，使道教在中国历史观察研究中的诠释意义，一直未获正视。这使许多人至今心存疑问：历史上的道教，对于中国历史和国人的内在世界、对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在整个文明机体中所占空间及携带的能量究竟如何？由于上述问题，要回答和理解这些问题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对于今人而言，已是艰巨

之事。历史上，道教曾经占据国教地位；道教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重要性及贡献，及其对于中国人的意义系统的维系，实乃今人难以想象；贬低道教其实是近代中国人文化自卑的表现。换句话说，道教表达而非影响着传统的中国人及中国气质；道教之变迁表达着中国文化之变迁；揭示道教史上的种种变迁，意味着从另一种方式和更深的层面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

真正的学术需要的是一种平心静气、公允客观的历史观。《神药之殇：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试图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提炼出一个理论解释模型，对道教史上外丹信仰向内丹信仰转化的原因、过程以及文化性质作出深层解读与诠释，力求重建一种切近中国文化自身逻辑的历史观，为中国文化和历史变迁问题研究，提供基于道教视角的观察和分析方法。

道教中长期实践的外丹信仰与实践体系，实是一种以工艺创造性为精神本质的文化载体，体现出强烈的外向攫能性，蕴涵着认识与控制外部世界的强烈冲动，而为中古科技之内在动力。然而道教历史上出现了由外丹向内丹转化的文化重构过程。首先是六朝至隋末，道教内部对外丹的致仙逻辑形成怀疑思潮。到初、中唐时期炼丹术的繁盛与危机并存，重玄之学带来新的理论震荡。唐末五代至北宋，外丹走向衰落而丧失主流地位，内丹术则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内丹探索者及相关著作，在社会各领域影响日增。对于学者来说，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揭示外丹向内丹转变的文化根源。

在检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逐层深入的研究，作者指出，道教外丹向内丹演化，系中古时期中国整体的思想、文化演变所致，而这一整体运动的本质在于内在化，即中国文化的内向攫能性的深化，具体表现为自中唐以后心性论思潮的盛行。这

种心性论思潮表现在道教自身，即重玄学的兴起、修炼方法的内在化以及外丹信仰的文化异质性的出现。它们共同驱动了道教信仰从外丹向内丹的历史演变。进而指出，内丹道在文化与精神本质上，实是一种内向的文化攫能方式建构；外丹信仰体系中的工艺创造性、外向认知性的文化气质流失，取而代之的是对道德化的心性境界的过度追求。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精神，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把握、控制世界的方式上出现了一种更深的巫术化倾向。

这里所探讨的，实是中外学界关注的唐宋中国文化的转型问题。现在，这一领域已有较多相关成果，然均未涉道教，不啻为憾事，实难达成深度阐释。要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式，就必须道出内在化的根源，道出那关乎每一个人之价值与意义关怀及实践的问题所在。事实上，唐末以后中国气质的内在化问题，包括道教丹法从外丹向内丹的转换，全真道对肉身执著问题的破斥，禅宗援道入佛所达的消融彼我之境界和宋明理学的道德化内省学问，均已从信仰的深度得到本质性体现。要把握这种转型的内在根源而不仅仅是文学的或生活方式的表现，就不可避免地需从道教这一内在精神巨流的变迁来加以分析，从而为这个昔日辉煌帝国的衰落，提供来自传统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变迁的内在解释。这应是中国历史研究中对未来文化走向具有精神参照意义的研究方式。

在世界文明史的另一维度，我们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西方早期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新欧洲的诞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尽管在时段上并不与作者本书所指向之时段完全相匹，却在观照的方法上颇有相似性，且对近代中国命运的前近代渊源具有极为重要的解释力。20世纪初，当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通过揭

示新教伦理的精神气质，推出一种对精神文化与社会发展之内在关系的深度研究模式，即为国际学术理论界提供了新动力。而现代人要准确把握和表达人类内在精神世界同社会发展的逻辑吻合关系，亦绝非易事，尤其是当我们观察古老的历史问题。而40年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林恩·怀特教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提出中世纪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文化的外向化发展逻辑，是造成近代以来西方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的文化根源（是“怀特命题”），则引起学术界、宗教界的巨大反响和思想变化，甚至导致了生态神学的兴起，是足可见此领域研究所可能具有之重大意义。此书之作，颇得此等思维方式之真。

蔡林波博士积多年之心血而作此书，并非唯丹道是论，而广及历史时代背景，还历史问题为文化生态之存在，故能较为真切地逼近可能的历史，并给与读者诸君以理解之基础及思考之余地。良苦用心，字里行间可见矣。

现实乃是历史之逻辑延续。我们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现实是我们的面，历史是我们的背。对我们来说，凭着理性而负责任的心，去研究中西历史发展变迁中出现的种种关键问题，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内构之自我调整，对于未来中国避免古人和西人之失误，探求人类精神世界与自我及外部世界之合理张力，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或学术崇高之所在，亦乃君子之所求。是为序。



2008年7月28日

序 二

蔡林波同志持其书稿来，嘱我为此书的出版写几句话。

最初认识小蔡，就是缘于此书的原稿，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当时去参加他论文的答辩，细读其论文，颇为其内容的丰富和洋溢出的才气所动。遂问及其毕业后去向，答云：未定。于是便向学校推荐，录用小蔡。如此这般，蔡林波便成了我的同事。一切机缘，皆从此书始。故非常愿意应邀写上几句。

蔡林波这本书，说的是一个道教史研究中讨论颇久却又远未深入的问题。做这样的题目，有时比还未有人涉足的领域，要难一些。盖别人已有些论述，现在要说些新鲜话，便有些难。但是林波的书稿却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外丹向内丹转换的文化机制，从而为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自己的理论模型，让人读之有得，读之有思。这样，便在道教史尤其是内外丹学的研究中增添了新的颗粒。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提出的问题非常专业，又能抓住问题的核心，而且深入到了研究对象的内部，具体地、尽可能丰富地拥有并分析了有关的材料。

说到深入与专业，在近十年来的道教研究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泛论性的论文和著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注意，而分散到各个专业领域的具体研究课题和成果，才多少能引起学人们的阅读与讨论。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整个学科的发展进程有密切的关系。

我国的道教研究，相对于佛教及其他宗教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很大一段时间里，进入其中并有所建树的屈指可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了变化。因为起步迟，道教本身蕴藏着的宝藏又极为丰富，在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其中，就如找到了富矿，在任何一点挖下去，都会有所收获。而根据当时的研究基础和研究能力，学人们在自己的涉足的领域里，往往还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其轮廓。而且谈论道教与中国文化各方面关系的著作，短短数十万字便览观一切。勇于开拓，却有些粗疏，是道教研究兴起时难免的经历。但进入 90 年代，情况便大有不同。一方面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有更多的力量，对许多要投入较大力量才能爬梳整理因而以前难以深涉的课题，开展研讨。另一方面，原来尽管在台湾以得到重印但在大陆仍深藏于少数图书馆的明《道藏》、《续道藏》，有了大陆出版社的新印本，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搜辑资料，准备编印续道藏，其成果以《藏外道书》之名称行世。人们有了更多地仔细研读道教原始资料的机会。这样，深入，具体化，便有了可能。同时，随着在各个领域里初步的开拓，面上的宏大叙事风格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局限，学术的发展本身要求更多地从具体的、专题性的研究中去开拓。这样，一本书，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专门而具体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博士论文的攻克目标，也可以形成数十万字的煌煌巨著。

蔡林波的这本书，就是在学术迈向深入的过程中，出现的一项成果。假如以改革开放开始时作为领军人物的老一辈专家算

起，蔡林波可以算第三代学人了。正是这第三代，正是他处于改革开放也是道教研究开始展开的第三个十年中，其研究才会呈现出具体而微、力求深化，也在某些方面迈越前修的特点。

二

道教研究中未发之覆如此之多，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当然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投入比起以往，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与之成比例的是，成果也比以往成倍甚至于成十倍地增加，每年的论文数百篇，专著数十部。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成果越来越多，能引人注意的成果，比例似乎越来越少。也许，是成果太多，反而引起阅读的疲劳？恐怕原因不会那么简单。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能够体现新视野新方法成果太少，似曾相识的论著太多，是其原因之一。缺乏新的方法，是制约道教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瓶颈之一。蔡林波的博士论文，当年之所以引起我注意，重要的一点，是我从中看到他运用新的理论视角去分析问题的努力。这样便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新意”的东西。诚如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说的那样，对于像外丹术占主导地位向内丹转型的问题，人们有了不少讨论，但却难以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在相关研究中，人们之所以对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有所偏差或片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道教丹术信仰本身的文化深蕴缺乏全面的把握，特别是对于外丹术的认识，大都过于简单化。事实上，不论内丹，抑或是外丹，都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载体，其背后隐藏着信仰者关于宗教的、伦理的、哲学的、工艺的多种要素的集合。”这里，他所使用的，就是一种文化学的方法，其核心概念，他称之为“内在化”与“文化攫能性”。运用这一方法，他得出了与别人有所区别的结

论，在我看来，也是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当然，他所运用的方法，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方法本身还有没有可讨论之处，要广大的读者去讨论，去评判。重要的是，他在方法更新、运用新的理论模型方面，进行了探索。

研究要有新意，关键就是要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尝试着用新的视角去观察问题，用新的理论模型去驾驭研究对象。我国的道教研究在起步阶段，历史学的维度，思想史的维度，占据着主导地位。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人们运用的方法才渐渐多元化。宗教人类学的，宗教社会学的，文化学的，宗教心理学的，乃至符号学的，种种方法，都有人开始尝试。这是成果不断丰富的前提。但是，总的来说，人们运用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外国引进的方法，还不那么熟练，有时显得粗疏，个别的更有似贴标签。道教的研究，开始了多元方法多元维度的尝试，从总体上看，还不那么成熟。其间的原因难以一言而尽，但与整个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创新不足不无关系。盖相比起具体教派、具体侧面的研究来，中国宗教学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成果也不多。较多的成就，是翻译、介绍和吸收西方的宗教学成果及方法，而原创的则非常之少。当马克斯·韦伯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名著介绍进来时，大家都兴奋地谈论起他，蒂利希的“终极关怀”概念一经引进，便成了许多人分析宗教的范式，而近年来史达克提出的“宗教市场”论，又在一部分学人中风靡起来。然而，问题是，那些产生于西方的研究范式，是否能够毫无批判地移用于中国，还是需要讨论的。因为中国的宗教与西方差异是那么明显，使得产生于西方的、主要从西方宗教研究实践中抽象出的理论模型，总有一部分无法解释中国的宗教，而中国的宗教穿上了西装时，多少有些不伦不类。这样说，不是贬低引进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价值，而是说，中国的学人，对于中国的宗教，需要更多

的深入观察和分析，结合别人的经验和理论，在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上，要有自己的创造。与整个宗教学理论创新不足相联系，道教研究缺乏成熟的理论模型毫不足怪。可以说，道教研究要进一步深入与繁荣，方法论的反思，是绕不过去的坎。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自觉性探寻，成果的重复，新成果却难免陈言的状况难以改变，更遑论突破与创新。

当然，方法论本身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必须在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蔡林波的探索，只是尝试之一，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人，参与到这种尝试中来，以期形成真正符合中国道教面貌和特点的、有自己风格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

借着蔡林波书稿出版的机会，就拉杂写这么几句，聊充为序。

刘仲宇

2008年7月1日草于建德花园寓所

前言

道教是中华民族最具本土性的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自身不仅广泛地融会了各种文化要素，而且对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道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所承载着的文化内容及表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就不会一成不变了。

道教作为古代中国主要的文化载体之一，它在中古时期（严格地说，主要是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外丹向内丹信仰的转变，实质上即意味着其整体文化精神品格的嬗变，而不仅仅是它内部的一种修炼方式的变革。而且，如果结合其历史背景来看，就会发现：道教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完全是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变迁紧密相联的。而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唐宋变革”——目前历史与人文社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自20世纪初〔日〕内藤湖南、陈寅恪等一批学者的发轫，“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认同。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曾力求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专题研究入手，试图

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见微知著”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笔谈》，杨际平等，《文史哲》2005年1期）。目前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等等。较有影响的论文则有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年5期），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年1期），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2期）等。国外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有〔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美〕刘子健（James T. C. Liu）《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美〕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等（具体内容，在本文导论中有叙述）。此外，近年来有关“唐宋变革”的专题学术会议也比较多，如2003年北京中青年学者唐史联谊会与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唐宋变革与道教研究学术研讨会”，2004年由中国唐史学会和云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不过总体来看，学术界就“唐宋变革”与“道教”关系方面的研究，实属有待拓展的领域。这是因为，一方面整个学界在“唐宋变革”专题中，针对道教方面的研究不多，相对而言，对

佛、儒两教的研究则较为贍实；另一方面，道教专门研究领域内的学者对这一时期道教丹术的历史演变虽然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注，但是仍然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

首先，大多研究比较注意外、内丹前后之间的延续性，而对其中的“转折性”内涵重视不够；其次，对内丹学及其哲学基础的演进非常关注，而对于早期外丹术及其思想、信仰的文化蕴涵及意义则多有忽视；最后，特别是在关于外丹术衰落的原因问题上，往往过于片面地强调“外丹”的毒性问题，而较少涉及和探讨其中的深层文化原因。总之，目前学界对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根源与历史意义缺乏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论证。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关注。比如，任继愈先生其实早就指出过：“世人论道教内丹之学，多认为它由外丹发展而来，这种说法虽不为无据，但还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内丹说，实际上是心性之学在道教理论上的表现，它适应时代思潮而生，不能简单地认为内丹说的兴起是由于外丹毒性强烈，服用者多暴死，才转向内丹的。‘内丹说’在道教，‘佛性说’在佛教，‘心性说’在儒教，三教的说法有差异，而他们所探讨的实际上是同样的问题。”（《中国道教史》上卷，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具体研究也已经逐渐引起了重视。如何建明的《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就从哲学思想、修炼技术、政治伦理取向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概述了中古道教思想信仰的内容变化。孙亦平的《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通过对杜光庭思想的研究来把握唐宋道教的转型，这对于把握整个中国道教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了解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

史地位与现实价值，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杨立华的《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姜生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导论》（科学出版社，2002）则皆开始注重从宏观的文化学观念角度对道教外丹向内丹的转化进行解释，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方法。此外，如李大华的《道教理论化的内化倾向及其生命观念和生命哲学》（《道家与道教》，陈鼓应主编，第8—1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韩国学者曹在松的《内丹学在宋代思想史上的意义》（《道家与道教》，第344—352页）等论文，也从转型的意义上对中古道教思想的演变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以上研究，无疑都对本书的立论和写作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启发和理论思路。特别是姜生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导论》、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杨立华的《匿名的拼接》等，对本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着直接的引导作用。尽管如此，综合地看，目前学界中有关中古道教丹术信仰转型的专门研究还是颇为缺乏有针对性、深入的、系统性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相关研究中，人们之所以对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有所偏差或片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道教丹术信仰本身的文化深蕴缺乏全面的把握，特别是对于外丹术的认识，大都过于简单化。事实上，不论内丹，抑或是外丹，都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载体，其背后隐藏着信仰者关于宗教的、伦理的、哲学的、工艺的多种要素的集合。如果我们不对之进行较为仔细而全面的考察分析，就很可能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造成人们对此一问题认识上的模糊性和片